

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

只是把觀察和胡思亂想記下，也希望有人糾正，我有很多東西都未搞清：

我跟友人得出的印象是：

- (1) 支持五區總辭的，很多可被稱為「左」／「社民連」（友人說，稱為「文化研究人」）；
- (2) 對總辭有保留的，可被稱為「社會科學學者」（友人說，稱為「政政人」）。

這些歸類，固然無法用作嚴謹分析之用，但卻可能有助我們認清某些基本的前設。

我認識的2的人，原因是目標不清楚，不知道會達到甚麼直接的效果；「變相全民公投」是非常抽象的東西；很大機會失去原有的議席，以及否決權；沒有打擊效果，因為五十萬人並不能威脅政府，實際上威脅的是田北俊。換言之，在爭取普選的歷史上，議會外的抗爭並沒有特別用處；更好的對策是（如有的話），留下、糾纏下去。又或者，他們會問，就算要做事，為何要是五區總辭？

我認識的1的人，原因有「這是個民主的過程」，即認為是個民眾學習參與的經驗；要製造議題；用人民力量迫政府做事；輸了也不大緊要，因為事實上沒事可輸，否決權不如想像重要；要在議會外抗爭（而實際上還有內在力量）。他們著緊的是比較抽象的象徵意義，立刻未必見影，長期是否有用，要隨緣。

到世代論。

當然，我們可把這兩種也標籤為「妥協」與「激進」的分別，或者「議會外」或「議會內」的分別，但我覺得這不是政治主觀判斷的分野，而應連同過往幾年香港的整體社會結構討論——又是世代論。就像昨晚圓桌跟關信基教授的學術晚宴，他指出支持總辭的多是年青人，這也是我的感覺。世代衝突的意味，似乎比其它價值的分野都要強。蛋頭式地指「長毛不是年青人」或「陳克勤都是年青人」，固然在邏輯和定義上非常統一（也把問題重新回歸到主觀的政治價值取向）；但愈來愈多關心普選的青人屬於社民連／Facebook／高登的派系，跟互聯網之前的世代愈來愈分道揚鑣，難道不是客觀而言更有說服力嗎？（真的很多青年人支持議會惡搞的）

青年傾向總辭，並不是因為熱血，而是看不到留下對他們（也就是香港的未來）有何利益和出路。我認為，第1類人用「過往二十年爭取普選的文化」（社運無用論）和「2003 七一遊行」（田少關鍵論）例，證明議會外的力量不及建制的內部爭取，是有點把「政治文化」或「普選運動」抽離整體社會發展。我反而覺得，正正是很多人發現，這兩件事對我們解殖和從國家手中爭取更多空間毫無幫助，之後才會衍生「社民連三子入立會」、「城市空間運動等生活議題政治化」、「政黨愈來愈無人理」、「靈活性的社會運動」等等在香港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與其參考「普選運動」這條單一的直線譜系，不如參考新一代「沒有殖民記憶的香港人」在整體而言傾向如何參與政治和社會議題。很明顯，議會和政黨愈來愈無力和青黃不接，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或許有人會認為，普選問題跟其它例如空間、經濟、教育等問題是不同的，需要議會內的聲音，因為它是個需要直接面對「國家」的議題。但想深一層，我近幾年聽過不少友人，傾向認同中國甚至連結中國的進步力量，同時對香港的老左派和第二代泛民深痛惡絕（例如，有人會寧願看《南方都市報》都不看《明報》）。單單是這種複雜的中港關係，我們已無法把

問題簡單看成是「香港」對「中國」的框架。

在這個意義上，刻下我們有兩個香港（姑且稱為「第二代的香港」和「第四代的香港」）、兩個中國（姑且稱為「中央」與「中國」）。第四代的香港人，對第二代香港的憎恨，絕對比「中國」更甚（看看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程度，總低於對中央政府的滿意程度），而對青年而言，所謂「中央」，與其說是陳雲式的「可怕中共」，不如說是第二代香港人跟中央保守既得利益者的「京港連線」。而喜歡引用「二十年普選運動」和「七一」的第二代泛民，在這麼多年來，對抗的除了是根本不能可擊敗的「中央」和無法改變的基本法體制，還有在其它新議題上起領導作用嗎？（我知他們會說，民主優於其它議題。但現在很明顯沒人信這套。因為慢慢我們看見，中國沒民主，有些民生議題都比我們進步了）多年被人抨擊除了普選之外在民生上毫無用處的泛民，真是了解新一代想建立的「香港」與「中國」嗎？

從以上發展下去，我們可以想像一下五區總辭和政改的後果。

首先，無論辭否，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普選，無論是甚麼年份。也不可能是我們想要那種普選，而是有門檻那種。這是理性的人都清楚的。中國升得愈快，香港降得愈急，這已不是大勢，而是事實，甚至歷史。香港是地方就是地方。海嘯後「中國超越美國」都已經是論者的潛藏共識了，還數你香港幹嗎。

其次，假使政改方案通過，收貨的人，只會是歌頌「七一」與「普選運動」的人，真的認為他們在二十年後「進了步」（對所有青年而言，很難認同這是「進步」，因為我們才剛剛熱身）

第三，當政改方案通過，民主黨與民建聯在所有議題上都完全一致。他們的第三隊，幾近毫無分別。而民主黨已在新一代中毫無威望，精英一點的進了公民黨、左一點的進了社民連。民主黨只能努力經營地區和把招攬對象的年齡層提升。在 2047 年之前，民主黨和民建聯可能合併，橫掃組織性的地區工作與議會。並根據練乙錚的說法，成立港區基層人大，為兩制統一預備。這是友人的看法。

第四，當政改方案否決，即所謂「原地踏步」，第二代香港人繼續肩負起沒人相信的「對抗中央」的任務；而青年人沒事可做，愈來愈在議會外把民生議題民主化和政治化，城市空間只是第一步。最近，Facebook 已有群組發起體育界在東亞運動會抗議體育的協會總會透明度不足和不給予本土青年人機會。你看今天足球界，有誰不是支持南華羅生推翻足總的？因為羅生代表的是青年人認同的「香港」身份，要打入亞洲，而不是在本土耀武揚威。

第五，無論政改方案是否通過，香港都會繼續做示威之都，愈來愈多要顛覆遊戲規則上位（或維持基本生計的人）。一天沒有真正的普選，社會經濟結構必然差不多：因為沒真普選，多了幾百個議席，都沒有抗衡富人的力量，地產金融等既得利益行業繼續主導社會，下一代一樣要放棄藝術與理想，從事物流會計，或其它無法預料的新興低賤行業；沒有普選，不用打文宣戰，不用智囊智庫，知識性或文字工作依舊低賤。又由於位置全被第二代人佔領，很多不願做 instructor 的人又會無野撈的人，會出來做公共知識份子或文化人，一嘗參與公共事務的心願；因為沒有普選，政府只須理會第二代香港精英及大陸（炒樓）精英，第四代的討論延續。而在可見的將來，由於中港文化差異和體制最少會維持到 2047 年，在香港的內地同學，如無必要，會傾向內地發展，也無須參與本土事務。當大陸工資徹底超越香港，連香港的精英也受不了而回大陸。留在香港的，是一大堆沒有技術沒有出路也沒有地方給予自由發展的香港人。當然，也會有很多基層香港人回大陸。

最後，回歸到五區總辭是否有意義。我認為，那事實上是象徵意義，不能直接連接到「間接公投」。而那象徵意義大抵是，告訴市民議會是廢的、傳統的協商是廢的，要離開議會。你是否支持，端視你認同這種象徵意義，還是認為五票和一個否決權更加珍貴。沒人知未來。但說回來，幾年前，有幾十人訓了幾次街，也沒人想像得了，後來會成立了一個發展局，也沒人知道，日後所有工程都要留意居民訴求與保育問題。那個時候，立法會和政黨在哪裡呢？

五區總辭、世代論、未來的猜想（一些小補充及延伸）

貼了這個 post 之後，就友人的分享及質疑，延伸如下，希望豐富有關討論：

一，「政政」和「文化研究」的分法不合理

是的。因為我只是在打 blog，也是跟友人閒談之下的戲言，是印象。所以我說這種歸類無法作嚴謹分析之用，但有助我們理解兩個 commonly share 的前設和觀點。但未想到更客觀的名字。對我來說，這很 minor。

二，究竟青年是否這樣想

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去說所謂的「青年」是甚麼。我初步的想法是，一群沒有殖民記憶、逐漸認同中國進步力量、不滿殖民香港／特區體制的人，用互聯網的技術交流分享，批評特區體制。我的感覺是，這批「青年」的思想、看法和方式，固然可以追溯到普選運動和許多香港社會運動（這也是大部份人的說法，即所謂薪火相傳），但從反抗的方式與關心的議題來看，我慢慢感到那是兩種時空，而不是直接繼承。我的感覺是，我們一方面知道我們有個彷彿很清楚的「香港身份」，需要繼承的是「五十年不變」、「爭普選」、「雙語並重」、「獅子山下」等九七前的文化遺產；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大覺得我們處於一個稱作「殖民地」的處境之中。我對「殖民者」毫無記憶可言，「大陸人」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恨，我討厭的是「香港高官」和很多法理解為何能身處高位的庸人。我受不了的是一種前朝光輝的神話。

很多反對「世代論」的人，都指責代際的畫分是「定義不清」和「本質主義」，指出所謂「青年老人」無法刻劃，which is 我認為捉錯用神。其實用任何字都可以是「定義不清」和「本質主義」的（這是語言的本質吧）。呂大樂和陳冠中的真正目的，是指出今天的香港是源於一個開放的環境，是告訴大家，現在我們愈來愈封閉了。只要你能把握這種關懷，究竟他用甚麼字眼，可以再討論。其實，他們說世代的時候，很明顯是用上社會的集體經歷作討論的支撐，而不是說「第四代人天生愚蠢」。不同時代的經歷，會產生不同世界觀、國家觀與 political agenda。這正是所謂「青年」的意思。「青年」不是很 young 的意思。

正正由於香港身份和民主的問題一直以來是「中港關係」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疏理「沒有殖民記憶的青年」的「中國」和「香港」是甚麼意思，我們就只會永遠停留在九七時期累積下來陳腔濫調，不知道究竟它跟我們今天和未來的關係是甚麼。個人而言，如上，我討厭的不是英國不是中國不是香港，是特區——一個承襲前朝不公平制度，製造今天更多暴力的始作俑者。至於「中央」，在我的感知下，似乎根本不理會特區，總之要維持現狀和認同國家就好。最近因為研究工作讀多了幾本書，更開始發現，後社會主義可能是這個世紀真正取得領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模式。當然，我不懂政治經濟學，沒能力去辨識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是否一個泡沫。但它的極速發展而令它開始得到文化領導權，是個事實。今天大陸還有很多問題，但主流而言，跟以前徹底否定式的「反共」是差天共地；今天談到中國的缺憾，倒更像是談論一些能隨著時間解決的「地方問題」。這是我們之前無法想像的。

其實，即使是最有能耐的經濟、政治、歷史學者，也無法談論一個國家和一個星球的生死。中國的存亡，對我而言，太遙遠。這些東西留給有實證考究的專家去做。身為一個公民和文化研究愛好者，我關心的是，如何維護一種集體的文化尊嚴。更關心的是，究竟政治界的人物，是否在體制上維護我們的尊嚴和利益。下一代的香港人，是否能在香港伸張理想。

三，沉默的大多數究竟怎樣想

由此，延伸到我一直最想談的一點：我們究竟站在甚麼立場和位置，作怎樣的思考。我不是經濟學家、我不是從政者、而是一個有書寫能力的普通公民。責任應是思考現在的政治走向，對我，一個沒有殖民記憶的人（這個字很長，很煩），有何影響。

換言之，我覺得要緊記的是，一個真心相信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普選在今天的香港是「好」的人，根本不需要理會學者的數據和調查。我們是公民、是選民，不是社會科學家，不用因為他們的分析而質疑自身的信念。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在數據調查之下協調出來的。當然，我不是說我們可自比法國大革命；我只是認為，那種找出「沉默大多數」的說法，完全混淆了究竟甚麼是「民主」。民主的構成主體是公民，不是專家學者，不是毫不關心政事的大眾（當然，日常生活中，你可以以上三者都是）。如果你是追求民主的公民，你只會說服大眾，民主是好的。過程中無須牽涉數據。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清楚，政黨的生死與我何干，它是否真的能代表你的利益。只有政黨領袖，才需要靠學者做調查，才需要思考議會的勢力和利益，因為他在玩政治遊戲；當然我們可尊重他們愛護他們，但卻不需維護他們，而只需決定其行動是否合乎我定義下的利益與公義。「泛民」不是永遠都對的，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甚至經常性不是二十三個人一起行動，也不一定支持你想要的政策，究竟他現在做的，對一代人（當然我只是指我和身邊認知的友人）而言，是否「進步」？還是「退步」？才是我真正會想的問題。

四，又是五區總辭的意義

所以，我在之前的 note 並沒有很明顯指出究竟它有何實質效用。甚至可以說，在一個這麼大的體制和歷史包袱面前，我都不知道辭來有甚麼意義。但至少現在的處境是：無論是否通過政改，我們也不會有普選、功能組別也繼續存在。而留在議會的「泛民」，跟建制派又似乎無甚分別。那留在議會，既無法爭取民主，又不是在投關鍵的民生票；政改是否通過，似乎也是差不多（多幾個議席是沒用的）。如果這樣，辭職，至少是個象徵意義。當然，自殺裸跑或任何更激進的也可以，如果有人願意的話。

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文：李祖喬、黃宇軒

《明報》·世紀，2010年1月15日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況？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

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況「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新的時間觀念

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況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

「我所目睹的 21 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 2004 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

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方式：新的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2003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況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於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

「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〇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爲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